

赫鲁晓夫 十年浮沉

[苏] A·阿朱别伊著

《ТЕ ДЕСЯТЬ ЛЕТ》



赫鲁晓夫 十年浮沉

[苏] A·阿朱别伊著
赵禹 刘光准 于淑洁译
裴家勤 校

宝文堂书店

А · Аджубей
ТЕ ДЕСЯТЬ ЛЕТ

Знамя, 1988, No.6, 7

赫鲁晓夫十年浮沉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 130,000 开本 787×965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4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2500册

书号 ISBN 7-80030-122-2/K·8 定价(平) 3.25元

中译本前言

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个沉寂了 20 多年的名字，这两年又登上了苏联的政坛和文坛，正如阿朱别伊讲的那样，许多人又开始争先恐后地同这个名字拉关系、套近乎了。可是，如果把时钟拨回几年，或者再多一点，赫鲁晓夫这个名字无论在苏联还是在我国，给人们引起的联想都是不大美妙的。提起赫鲁晓夫，往往会想到“土豆烧牛肉”、“老玉米”、“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甚至不称“赫鲁晓夫”，而称“赫秃子”，前面还要加一些定语。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那么，赫鲁晓夫这个人究竟如何，阿朱别伊的这篇回忆录也许是个颇有价值的参照。

当然，尽管作者声明在先，要尽量客观，但作为女婿写丈人，要做到十分公允也是难的（人之常情嘛，可以理解）。回忆录基本上是只说好，

不说坏，至少是说好多，说坏少。可以感觉出，作者是在跟着老丈人委屈了 20 多年之后，要出来为赫鲁晓夫（也为自己）打抱不平。然而，尽管如此，回忆录还是为我们描画出一个比较真实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赫鲁晓夫的形象。之所以这样讲，一，回忆录中对赫鲁晓夫的思想、性格、作风以及政治观点的描述，与我们过去通过报刊、书籍，甚至通过书面宣传所得到的印象能够对上号，至少基本相符；二，对赫鲁晓夫从上台到下台所经历的各个重大事件的描述，特别是所透露的某些政治内幕，与我们过去从外部知道的情况一对照，颇合乎逻辑，甚至使某些过去觉得不合逻辑的事，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赫鲁晓夫当然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是时代造成的。笔者不想在这里评说他的功过。不过，在读了这篇回忆录后（当然也联系到过去的一些印象），觉得这个尼基塔还不失为一个诚实、善良的人。他不整人，不害人。这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列宁不就是因为斯大林的粗暴而建议换下他的总书记么。托尔斯泰也说过：“伟大总是伴随着淳朴、善良和真实。”

裴家勤

1966 年的新年我和妻子是在挚友家里过的。他们住房的窗户朝着伏龙芝滨河街。眺望窗外，一片严冬景色：河面铺着积雪，高尔基文化公园林荫道上盖着冰层，滑冰者的人影隐约可见，处处是五颜六色的彩灯，旋转花炮闪闪烁烁……涅斯库奇内花园仿佛不在城里，幽暗昏黑，同四周缤纷的色彩和明亮的灯光形成对比。这光亮与黑暗，犹如关于善良与邪恶的童话，跟我们那等待第 12 响钟声的喜忧参半的心绪可谓配合默契。

黑色的货车发出沉重的隆隆轰响通过环城铁路桥。我对节日坚持工作的人们总是怀着同情之心。报社编辑也经常这样值班。那个夜晚，我在《消息报》社里的同事们会拿着编好的版面请另一位主编签字。现在，我在节日期间的晚上和夜

里可免于值班了^①。

几乎已是凌晨，来了三位晚到的客人：一位著名演员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位高级军官。几个女人数了数他肩章上的星，经过男人的解释，才知道是位上将。

“我们和将军刚刚才认识，但得说是去年了，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招待会上。请多多关照。”演员说了将军的名字和父名，看来他也只了解这些。

这位将军同意“玩个通宵”，确是难能可贵。他来到陌生人家，显然并不感到过于拘束。在迎接新年的日子，大家都显得善良、聪明，好像人人都是朋友。将军立刻赢得了主人的好感。他身材魁梧，嗓音低沉，善于在席间和颜悦色地应酬，当大家感到困乏时，他能使大家重振精神和兴致，就像有经验的看守篝火的人，懂得及时添火……

有多少这样的夜晚在我们的生活中匆匆逝去，有多少言辞白白花在除了不现实的愿望（这些愿望在生活境遇的重压之下沉入深渊）之外常

① 阿朱别伊原任《消息报》主编，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后不久他也被解职。——译注，下同。

常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之中！然而，我们还是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欲止不能，虽然心里明白，语言的瀑布与尼亚加拉瀑布^①完全是两码事。

那个迎接新年的“多话之夜”，要是没有这位将军，也许早就被遗忘了。我没有留意，将军和主人谈话时什么时候调门儿突然升高了。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听出，谈的是赫鲁晓夫被罢官的事以及这件事可能引起的后果。

“我告诉你，这是我国历史上丧失掉的10年，该诅咒的10年，”将军几乎是扯着嗓子喊道，“你赶紧把它忘了吧，你就是求着人家，也不会有人信你这一套！”

主人反驳客人，客人怒气冲冲地开始扣制服钮扣，并拽了拽演员肩膀，说：“咱们走！上这儿作客，真没意思……”

演员似乎在打瞌睡，他用细长的双手的手掌微微掩着眼睛。但我看见，他那紧绷着的颧骨正在颤抖。我和他曾在艺术剧院办的剧校一起学习过，知道他是直性子，火爆脾气，显然他马上就要火冒三丈了，真不知事情怎么收场。

① 美国与加拿大的界河——尼亚加拉河中流的瀑布。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却站起来心平气和、很有礼貌、不失分寸地说：“可我，将军，认为这10年是伟大的10年。我们和您有不同的评价。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知为什么您竟不允许我们的主人有自己的观点……”

我们生活中从1954年到1964年这几乎被遗忘的10年究竟是怎样的10年呢？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劳动和生活的10年，是千百万人在各式各样的冲突和境遇中决定其命运的10年！为什么某些人一定要把这10年从我们的记忆中磨灭掉，仿佛这些年代隐藏着罪孽？难道遵照一两个哪怕是万能的人的旨意，就可以从书本上、影片上砍掉人名和事实、数字和对比么？事情会是这样简单么？

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讳莫如深，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一些天真的人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党政活动持否定态度。但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是因为赫鲁晓夫当年冒大不韪触动了官僚行政体制，所以它的代表人物就对他“决不留情”。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显示力量”以儆效尤：“别碰我们！”

任何最精密的计算机对那个既不太平静又不太简单的年代也许算不出一个无可争议的评价。

想把画笔蘸上黑色或者粉红色油彩来描绘我国历史上不仅那10年，而且整整70年，这本身就是荒谬而可笑的。

理智地反思历史的理智的时刻已经来到，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有一个自然的愿望——还人民以历史，对此不作出回答是有罪的。这个回答无疑将由许多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共同努力来作出。我们希望，在这个人们自我认识的过程中，能有一席之地为“赫鲁晓夫的10年”作出客观的分析。

忘记过去是危险的。我们已经懂得，“遗忘”与“停滞”是一脉相承的两个词，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除掉这两个词固有的沉疴痼疾。这样作没有沸腾的热情不行，可能会有痛苦，有损失，但也一定有所得。今天，跟党的二十大以后那些已经遥远的年代一样，欢乐与动荡并存。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与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连，我的大多数朋友，包括纳·格·洛尔德基帕尼泽和她丈夫维·瓦·萨任，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奥·尼·叶夫列莫夫^①，就是那

^① 苏联著名演员、导演，1976年获人民演员称号。

个从克里姆林宫新年招待会把“喜气洋洋的”将军“带到”萨任夫妇家来的那个演员，依旧忠于青年时代的信念。

我们的朋友仍然住在伏龙芝滨河大街，他们的女儿娜塔莎已经长大，结了婚，我的三个儿子也已成了大人。在那个新年之夜，他们安详地睡着，不知道大人们进行了争论。他们常常问，我国很久以前和不久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理应给他们讲讲这些。

回首往事，我并不为自己当时未作详细纪录和未写日记而责备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充满内幕秘闻的回忆录。这是一个新闻记者的实录。这个记者先在《共青团真理报》后在《消息报》任职，他的工作涉及很久以来避而不谈的那些年代。

我的“日记本”一是头脑中的记忆，二是报刊的合订本，其中反映了我的全部观点和兴趣。不要天真地认为，我对事实的评价没有一点主观色彩，不过我将尽力从事实出发。

“事实要深深渗入记者的肉体，有如矿工身上的煤尘，”鲍·波列伏依这样教育《共青团真理报》的年轻记者。他讲了个故事：“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选举时，我接到一个任务：为一位代表候选人

——列宁格勒工人写个报道。我去列宁格勒跟那人谈了很久，谈得很细，在他家里不断地喝茶，——认识家人。等到《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我的特写后，我加上几句赠言给他寄去一份。不久收到了他的回答：‘您描写得都很对，记者同志，但干吗要让我站在镜子面前梳头呢？难道您没有看见，我是个秃头？’我的同行兄弟们，不要把梳子变成我们这一行的土木工具！”波列伏依激昂地说。

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则需要遵守。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观念去衡量过去，忘记事件是发生在那时那里，不是现在这里。“唉，要是……”这种幻想的叹息是不足取的，于事无益。当我们之中许多人感到二十大的爆炸力正在逐渐消失，感到原地踏步就要使我们不进则退时，其原因是不难想到的。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是否应责备自己，即责备那些坚决捍卫二十大事业上的那些人，或者老实承认没有足够的勇气卫护自己的观点呢？是否应把某些事情归罪于安分守己、贪图舒适的恶习呢？或者把一切的一切统统算在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帐上？这是最简单不过的解释办法，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对此意味深

长地耸耸肩膀一样。

我们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现在，当公开性原则不仅大大增强了它的意义和责任，而且也引出许多话头时，那些随便地、匆忙地宣布真理的人，很遗憾，多半是从来也未遭受过重大损失的人。

我对儿子们说：是的，我们有错。错在我们四分五裂，由于知识分子的自身局限，我们没有像耶稣会般抱成一团的官僚阶层那样行动。我常向他们念叨一个格言：“不要责怪那些没来得及或者没能做完什么的人，也不要妨碍正在完成一件工作的人，主要的是要及时做完你自己该做的事。”

1987年春，庆祝《消息报》创办70周年的那天，我应邀参加庆祝大会，并上了主席台。20年的中断使这件事成了我的节日。那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自己的同事。在发行量很大的《消息报人》登载了几篇以往同仁的短文，其中也有我的一篇。我这样写道：

“报纸读者明天才能获知的消息，报人今天就知道了。他们超前生活，因而他们生命的消耗也比所希望的要快得多。在这个值得《消息报》

庆祝的时刻，我想起了今天不能和我们共同庆祝的同事，无论就他们所献身的事业还是就他们表现出来的良知来说，他们完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我本想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我打住了：名单可能太长，也太沉重。

“我没有和亚历山大·鲍文一起在报社共过事，但我完全赞同他的思想：或者是他们，或者是我们，不存在第三者。那些想呆在预备队里苟且偷安的人，体会不到职业记者的幸福。我说这些话，是因为大约30年前‘消息报人’作出的‘第一次尝试’并非毫无结果。或许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从已占领的阵地上后退了，但通过尝试我们懂得了报纸能做些什么，我们这个职业的力量有多大——如果我们坚持党的原则性、民主精神和公开性立场的话，如果我们能分清服侍与服务这两个概念的话。

“今天的《消息报》同仁是令人羡慕的！有进攻的经验，也有不允许疲塌拖拉的时刻！”

在政治上，在社会生活中，倒退有时是从细小的、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后来，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这是一个长期的、按上帝定下的时刻发生的落潮，它延续的时间可能比一个人的整个一生还要长。我国历史上就有这样

的例子。二十大为数以千计的斯大林的专横的无辜牺牲者恢复了名誉和人格，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无所谓了。正如我们是否确实会建造答应要建的纪念碑，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一样。然而纪念碑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它体现了我们的意志，确认了我们的理想。纪念碑“倒着”建是危险的，它很容易从基座上栽倒。

在那个纪念《消息报》70周年的晚上，一位我认识的文学家说：“我们还算走运。我们从二十大后开始工作，但愿二十七天后我们还来得及干点事。”

我们两人都知道，事情不会一帆风顺，现在不是也有人表示遗憾么：可惜“赫鲁晓夫一代”至今阴魂不散。他们还在幻想“铁腕”、“强权”，认为这是摆脱一切灾难的法宝。没什么，这并不新鲜。托洛茨基分子也曾断言，世界上没有比民主更加反动的东西了。那位“喜气洋洋的”将军兴许是考虑不周，也说了类似的话。

梅洛尔·斯图鲁阿也在《消息报人》的纪念专刊上发表了文章。1959年时他属于记者中的积极分子，属于人们所说的思想活跃的人。我们两人，一个主编和一个文学编辑，不讲客气，经常跑到印刷所的拼板处修改令人厌烦的公式化标

题。我们抓住每个机会冲破平庸、乏味、单调的牢笼，努力激起读者的兴趣。

有一次，梅洛尔接受编辑部的一个紧急任务，到第一食品商店买了四公斤黑鱼子酱，当夜送到舍列梅捷沃机场，请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把这个包裹捎往伦敦。我曾在电话里请求查理·卓别麟把他《自传》中的一些章节让我们首先发表，他就要了这鱼子酱作为稿酬。这本书不久就要问世，《星期日泰晤士报》准备一星期后刊载它的片断。

卓别麟解释说，他要为该书出版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鱼子酱可是用得着的东西。

当我们的驻英特派记者奥西波夫把装有四公斤的鱼子酱的一个大包（从《消息报》食堂要来的一口锅，里面塞着向卖冷饮的妇女要来的冰块）送到饭店时，卓别麟对他说：“真是发了疯。这些人逼得我走投无路了。”他给了手稿。

查理·卓别麟是个说话算数的人。

我们的特派记者得到手稿之后，立刻坐到电话机旁，边读边译，把书中最精彩的片断口授给速记员，足够排整整一版的。我们当天就把它登了出来。读者看到这个不寻常的材料时十分高兴。版面上还辟出一小块地方，叙述了获得稿子的经

过。报社同仁也都喜形于色。我们的笔尖“刺了一下”西方的报纸，特别是《星期日泰晤士报》。原来，不久以前这家报纸的主编到过《消息报》社，他颇为自负地试图教训我们办报要讲效率，善于随机应变。

当这位赫赫有名的主编看到刊载着卓别麟《自传》片断的《消息报》时，他竟有足够的勇气给我们编辑部打电话，请求允许派他的人员来莫斯科进修。

顺便提一句，我们的会计也是喜出望外。这版稿子没付分文外汇。在那时，在1960年时，鱼子酱才22卢布一公斤，这是莫斯科的价格。我们没有打听它在英国的市价，估计要贵一些。

我写这几句题外话，是想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我要冒昧地引用梅洛尔·斯图鲁阿在《消息报人》纪念专刊上写的一段话：

“我想起了编辑部的一个不眠之夜。时间是60年代初。主编在讨论工作的碰头会上向大家谈了自己的焦虑心情。他说：

‘二十大以来我们的报纸前进了一步。但时光流逝，我们却总在原地踏步，车轮空转，明天报纸出来后我们开个会，讨论讨论这第二步怎么迈出去。请大家都参加。时间不限，如果有必要，